

# 社会治理传播研究：理论体系构建与研究展望

王国勤

**摘 要：**新媒体技术的广泛使用深刻形塑了社会治理中的传播结构、机制和过程，但是理论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滞后于这种正在发生着深刻变革的实践。为了实现新媒体时代社会治理的知识重建，需要创造“社会治理传播”概念，并据此来构建一个涵盖社会治理传播的要素、机制、层次和场域等四个基本方面，具有引导研究功能的系统化知识框架。近些年来丰富的相关文献显示，设立一个新的学科分支“社会治理传播学”不仅必要而且可行，并且必须走出内卷化的窘境和有效开展本土化研究。

**关键词：**社会治理传播；新媒体技术；媒介机制

**作者简介：**王国勤，男，教授，博士。（浙江传媒学院 新闻传播研究院社会治理传播研究所，浙江杭州，310018）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418（2020）03-0024-10

往往一些看似巧合的现象，激发了研究者的好奇心。这里就有一例。人类社会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进入了基于数字式互动技术的新媒体时代，而在我国，这恰恰是“社会治理”概念开始进入学术视野的时期。另外，把社会治理现代化和新媒体建设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步伐也几乎是同步的，前者始于 2013 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者始于 2014 年的“文化传媒新政”<sup>①</sup>。这些看似巧合，其实不然，事实上是源于新媒体技术与社会治理之间的某种深刻关联。本文所展开的讨论就是由这种深刻关联启动的。

## 一、新媒体时代社会治理的知识重建

“社会治理”是一个中国化的复杂概念，可以简约界定为“社会各种机构、组织和个人等行为角色主体，共同参与解决社会共同体面临的麻烦和问题的过程”。<sup>[1]</sup>其中“社会共同体”表明“社会治理”概念中的“社会”并不是指与国家对应的那个社会，而是涵盖了包括国家与社会在内的整个共同体。而多个行动角色主体的共同参与则展现了“社会治理”区别于“统治”和“社会管理”的关键特征。学者们从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开始使用这个概念，并不断推动这项研究，直到 2013 年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将“社会治理”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概念，社会治理研究开始成为一门显学。但是，这么多年来众多社会治理文献并没有充分地关注到“新媒体”这个社会治理的重要背景或技术要素。显然，围绕新媒体与社会治理的知识构建是滞后于实践的。

“新媒体”概念也难以清晰界定，但是大致可以说它“主要指基于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及其他现代信息技术或通信技术的，具有互动性、融合性的媒介形态和平台”，以及“基于上述媒介从事新闻与其他信息服务的机构”。<sup>[2]</sup>由此可以看出，“新媒体”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为数字化、融合性、互动性、网

**基金项目：**本文系 2018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群体性事件话语模式冲突的化解机制研究”（18BZZ015）、浙江社科规划重点项目“地方治理中的意识形态话语实践：国家与社会”（18NDJC037Z）的研究成果。

① 指 2014 年 8 月 18 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通过《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其系列指导思想原则被文化与传播界称为“文化传媒新政”。参见孟威：2015 年新媒体研究：真实、趋向与新意 [J]，当代传播，2016（1）。

络化。它作为专用名词，显然不是在简单的“新”与“旧”相对意义上来使用的。当新媒体技术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得到广泛使用时，可以说人类社会的“新媒体时代”到来了。它和“互联网时代”“大数据时代”等属于家族相似性的概念。

众所周知，当新媒体广泛渗入到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时，本身也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因此可以说“在传媒成为‘人类皮肤’的今天，传媒覆盖着一切，传媒呈现着一切”。<sup>[3]</sup>新媒体的特质及其无孔不入的力量已经深刻地渗入或改变了社会治理的理念和实践。对此，学者们开始注意到新媒体给社会治理带来了什么，以及做了一些理论建构工作。无论是学者的关注还是实践的发展，新媒体技术在传播中的运用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推进几乎都是按照相同的节奏在发展，其深层机制在于新媒体技术的广泛使用深刻地改造了集体行动中的传播与沟通的结构、机制和过程，从而促成了多主体参与实现集体合作的社会治理完成从理念到实践的建构。由此可以说社会治理与基于新媒体技术的传播从诞生起就是互相嵌入、无法割裂的整体。与之相应，社会治理研究和传播学也在议题、理论和方法等诸多方面产生了交叉共生的问题域。也是基于这种状况，社会治理中的传播现象也一直得到学者们的关注，而且有很多文献在不同的视角探讨这个问题域的诸多议题。而吊诡的是，新媒体技术对社会治理传播所施加的深层机制虽然被大量的研究文献从不同的层次或角度予以揭示，但长期以来，学者们基本上还是在“社会治理”与“传播”两个领域分开来进行理论研究，而且大多是传播学的学者们在关注相关问题。这种状况显然跟不上研究的需要。因此，需要把社会治理研究与传播学丰厚的学术积累结合起来，探出一条新路来。换言之，这是新媒体时代社会治理的知识重建之路。

在这种实践和理论的双向推动下，本文首次尝试使用一个体现这种趋势的研究概念——“社会治理传播”<sup>①</sup>。它是用来概括社会治理中的传播现象和规律以及社会治理经验本身的传播过程。“社会治理传播”概念，类似于“政治传播”概念。这两个概念都是偏正结构，前者限定了研究对象的范围或属性，而重点落在“传播”上。当然，光有概念是不够的，还要看能不能够围绕它建构一个具有引导研究功能的系统化知识框架。与该概念相应，“社会治理传播研究”被界定为以社会治理中的传播现象与过程为研究对象，主要采取实证方法进行研究，旨在探讨蕴涵在这些现象与过程中的通则或规律。在这个思路的指引下，本文试图从实践与理论相结合出发、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探讨：“社会治理传播研究”在中国语境下是怎样展开的？可以提供什么样的知识框架？这两个问题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共同指向第三个问题：对推进该研究可以做出哪些有价值的展望？

## 二、社会治理传播研究的现状

通过在中国语境下的经验观察以及大量相关文献的回顾，本文试图围绕社会治理传播的要素、机制、层次和场域等四个基本方面初步构建一个有助于全面梳理研究现状的知识框架，如图1所示。其中，社会治理传播的要素主要包括权力、信息与话语，社会治理传播的机制主要包括沟通机制、舆论机制和谣言机制，社会治理传播的层次主要涵盖了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社会治理传播的场域主要是指风险社会、乡村社会和城市社区。进而言之，本文把社会治理传播研究初步划分为这种4大类和12小类的知识框架体系，这种划分有助于用来分析众多议题或视角的类型学知识建构。而在实践中或在具体理论运用中，这些类别之间的关系如图中双箭头所呈现的纵横交错、互相融合。当然上述分类中，有些并不十分符合逻辑学上的分类不交叉的标准，但是有助于分析复杂的实践和展现已有研究的诸多重点议题。

① 致谢黄敏教授！在她的倡导与启发下，我们开始使用“社会治理传播”概念，并成立了浙江传媒学院社会治理传播研究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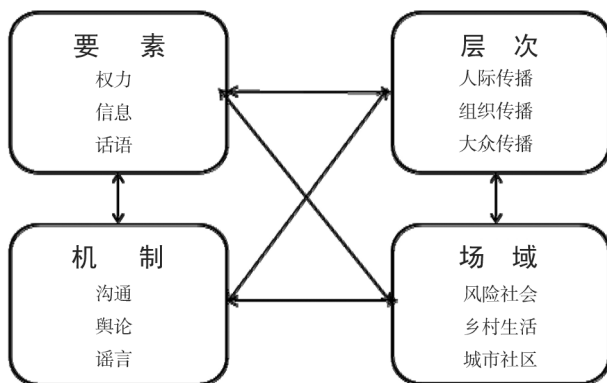


图1 社会治理传播研究的初步知识框架

### （一）社会治理传播的基本要素

“权力”通常被认为是集体行动中的核心机制，因为“社会围绕价值观和体制而界定，而什么是有价值的以及制度化的，则由权力关系来规定”。<sup>[4]</sup>鉴于此，社会治理传播研究需要从权力现象入手构建其知识体系。其次，信息与话语也是构成社会治理传播研究的基本要素。传播的是信息，而对信息的解读一定是情景化与多元化的，这项任务又依靠话语分析。这些要素不仅本身就是社会治理传播研究的重要内容，而且是构成社会治理传播的机制、层次和场域等研究的理论基石。

#### 1. 权力要素

首先，在学者们看来，新媒体带来的改变集中体现在“技术赋权说”，即“新媒体一方面强化了公民为代表的公共权力，但也增强了政府的控制力和市场的渗透力”。<sup>[5]</sup>国家赋权，自不待言，那么社会赋权是如何形成的呢？虽然媒介本身并不能归入到权力体制，但是由于媒介权力主要来源于传播中受众的自觉认同，同时它并不能专属某个特定主体，这两个特点使得这种赋权成为可能。对此，学者最关注的是社会赋权所带来的变化，其中“更多地为社会中的相对无权者进行赋权，使权力和垄断资源从国家行为体向非国家行为体转移”。<sup>[6]</sup>其次，新媒体发展就是在这种赋权的过程中对社会治理既有的权力体系进行了重构。对社会力量借着可资使用的媒介权力而不断壮大的情形，有些学者表现略显激进，甚至认为出现了显著的“去权威化”或“再中心化”现象。我们必须承认一种新的权力结构远没有定型，同时对它的观察需要摆脱一种零和博弈的思维模式。事实上，这种变迁呈现更多的是在分散化和扁平化趋势中“动态演化、合作共生与多方博弈的新图景”。<sup>[7]</sup>最后，对社会治理而言，这个图景并不全是和谐的画面。一方面是因为当前我国社会治理模式仍然有政治化和行政化程度比较高的特点，这会与新的权力结构形成较大的张力，由此制造出诸多的治理问题。<sup>[8]</sup>另一方面可能会出现由于“大众媒介权力主体的非理性化倾向，导致大众媒介权力的滥用”，<sup>[9]</sup>因此需要警惕这种传播的民主幻象。<sup>[10]</sup>鉴于此，需要国家与社会齐心协力，在发挥好媒介权力的积极治理功能的同时，对媒介权力实施多方面的有效控制，<sup>[11]</sup>旨在构建一个良好的网络政治生态，能够更好地实现国家与社会在社会治理中的良性互动。

#### 2. 信息要素

我们进入了一个“人人都能生产信息”的互联网群体传播时代，其中新的信息生产方式带来了新的社会资源配置途径。<sup>[12]</sup>在这个背景下，社会治理可以理解为“在本质上是行政组织与其他行动主体在信息沟通、交换的基础上达成集体行动的过程”。<sup>[13]</sup>首先，新媒体的使用导致社会治理中信息传播的机制和方式发生革命性的改变。对各方治理主体而言，“无论是对政府部门还是对政治参与个体，都展现不同的机遇，也在不同程度展现中国政治参与的新图景”。<sup>[14]</sup>而对社会秩序而言，新媒体所带来的信息传播在内容、结构、流量和时机等维度上都产生了深刻影响。<sup>[15]</sup>其次，这种变迁中的结构、技术和观念等

因素也造成了社会治理中“信息传播不对称”“传播失灵”和过度依赖“技术治理”等问题。最后，需要思考社会治理如何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积极应对这种变革带来的诸多问题。学者们提供了社会治理的“信息空间”研究范式，旨在研究社会治理中的信息生产和交换过程，以填补从信息论的角度思考社会治理变革的理论方面的不足。<sup>[13] (12-17)</sup> 为了强调其公共性，又衍生出“公共信息空间”<sup>[16]</sup> 概念。如何优化公共信息传播机制和传播模式也是个研究热点。经验中可以区分为以政府为主体和以第三部门为主体的两种公共信息传播机制。<sup>[17]</sup> 其中，关注更多的是第一种类型，涉及政府如何运用新媒体、政府信息公开等议题。公共信息传播模式研究主要围绕模式与公众获取信息的效果以及主体间互动模式类型学分析等议题。这项研究也分别在农村信息传播和危机信息传播等场域中展开。

### 3. 话语要素

无论是新媒体时代社会复杂治理的现实经验，还是传播研究发展的内在需求，都需要社会治理传播研究来一次更高层次的“话语转向”，即采取“更为多元的方法”来研究“更为广阔的议题”。<sup>[18]</sup> 事实上，近些年来，学者们在社会治理传播研究的“话语转向”方面，展现了丰富多元的理论资源和较高的运用理论分析经验的能力。首先，学者们从诸多视角来高度关注社会治理的话语重构问题，其中主要围绕多元话语体系下如何实现合作治理或共同治理的话语重构。<sup>[19] [20]</sup> 其次，在研究范式上，这些研究多为案例研究，其中比较常见的研究范式有话语分析综合法、批判性话语分析、话语制度主义、多元话语分析、建构主义等，另外也不局限于文本分析，多模态话语分析也开始得到使用。其三，在话语机制研究方面，集中于微观权力、话语博弈与策略、话语空间建构等方面。其四，在话语类型的选题方面也展示了广阔性的特征，涉及到标语、表态话语、政策话语、新闻报道话语、事件的话语和自媒体话语等。最后，话语分析运用得怎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语料库建设的质量。已有的研究体现了来源的多元性以及较好的可信度。其中来源包括人民网等官网，还包括微博、论坛等众多自媒体、主流报纸和官方报纸等，而且对话语抽样的分层比较做到了尽可能全面。

## （二）社会治理传播的机制

沟通机制是参与治理的多元主体之间各类信息沟通的平台与方式，是社会治理传播中的核心机制。在新媒体时代，这种沟通机制深深地嵌入了网络化、数字化的网络环境中而呈现出新的媒介化特征。由此，有学者提出用“电子治理”概念指代“这种契合网络民主时代多元主体的互动与合作的（治理）实践模式”。<sup>[21]</sup> 沟通机制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沟通机制指参与主体之间为实现特定治理目标而正式建立的、基于各种媒体载体的沟通平台或方式。而广义的沟通机制除此之外还包括社会舆论与谣言等这些具相对独立性特征的非正式沟通机制。

### 1. 沟通机制

这里讨论的沟通机制采用了狭义的概念。学者对此主要从具体机制和沟通平台两个维度上展开。首先，在具体机制方面，主要讨论了如何优化对话机制的问题。其中，在原则上，学者提出共享思维和公共目标是使对话真正成为合作治理中的有效沟通机制的必要条件。<sup>[22]</sup> 在技术上，倡导实施多种形式的、嵌入基层协商实践的开放空间会议，<sup>[23]</sup> 甚至有学者提出了数字协商民主<sup>[24]</sup> 或网络协商民主<sup>[25]</sup> 等概念。对话机制中有一种重要类型即“风险沟通机制”也很受关注，主要用于一些案例研究。而进入对话机制的内部，可以看到一些文献对“议程建构”和“共识建构”等环节展开研究。其次，在沟通平台方面的研究也是比较丰富的，涉及到众多的媒介载体，例如电视问政、行政听证、网络问政、微政务等，这些研究以经验研究为主。

### 2. 舆论机制

新媒体时代随着自媒体舆论的出现，其自带的“去中心化、涌现性、草根性、复杂性和自组织性等特征”，<sup>[26]</sup> 使得社会治理传播中的网络舆论呈现出更加复杂、更难“控制”的局面。舆论研究也发生



了转向,开始聚焦于网络舆论的研究,新的问题意识和研究路径不断涌现。<sup>[27]</sup>首先,对网络舆论的功能分析主要还是聚焦于传统的一些功能,例如有助于促进公共理性,更好地发挥舆论监督的功能,同时也要警惕一些新的网络舆论风险。更为细致的分析体现在对动员方式与舆论效果之间关系机制的讨论。<sup>[28]</sup>除此之外,也引进了后现代的视角,提出网络舆论具有一种新的“可见性”功能,即“不是以达成共识为依归,而是展现不同主体的共同存在”。<sup>[29]</sup>其次,在研究范式上,使用最多的是心理学视角,集中在社会心理、非理性等情绪与舆论的关系。其他一些经典的范式也在使用,例如框架理论、沉默舆论等。也有学者不满足现状,提出为了应对网络舆论复杂、多元的主体符号实践,研究范式需要转向。<sup>[30]</sup>其三,对于网络舆论的过程分析,包括生成机制和演化机制两个方面。其中,生成机制方面聚焦于新媒体如何参与到舆论形成的广泛讨论。演化机制方面,涉及传播模型和极化、反转等机制。最后,在网络舆论的治理方面主要关心的是新媒体条件下如何有效地进行舆论引导,这是广为关注的一个研究议题,研究文献比较丰富。

### 3. 谣言机制

借助新媒体技术的网络谣言,与传统谣言相比,其类型、功能影响、传播模型和机制等呈现出更加复杂的状况。首先,研究中发现网络谣言中,社会生活类谣言比例最高,其次为情绪类型而愿望型谣言最少。<sup>[31]</sup>功能上,“谣言在不同的传播媒介中具有不同的扩散效应与集体行动效应”,事实上网络谣言的散布和传播并不比传统谣言更加容易扰乱社会秩序或引起大规模的集体行动。<sup>[32]</sup>甚至有时候会具有一定的正面效应,例如可以发挥社会协调机制或社会资本的作用。其三,对传播模型的关注已经从经典传播模型过渡到复杂社会网络上的谣言传播模型,学者们提供了多种关于公共事件的传播模型。<sup>[33][34]</sup>关于生成、扩散与激化等传播机制的研究,除了结构性因素仍然得到广泛关注外,学者们还提供了众多的机制,例如信息拼图、唤醒机制、匹配效应、符号学特征和框架建构等。最后,在完善网络谣言治理机制方面,学者比较关注治理长效机制的构建,<sup>[35]</sup>而就具体的谣言事件的治理而言,需要构建有效的网络谣言消解模式<sup>[36]</sup>以及谣言自净化机制。<sup>[37]</sup>

## (三) 社会治理传播的层次

按照传播学的惯例,根据参与者规模与传播模式的不同,传播的层面大致可以划分为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进入了新媒体时代,随着网络数字互动式媒介的广泛运用,这三者之间的区别也日渐模糊,融合的趋势在加强。但是这种分类仍然有其理论分析和经验观察上的合理性,尤其是社会治理传播研究也需要在这种分类基础上展开。

### 1. 人际传播

社会治理中的人际传播指的是在具体场域里通过人际互动、关系维持与发展等传播机制来对集体行动的过程或效果施加影响。这个传播层面的经验容易观察,加上人际传播方面的学术积累比较丰厚,对该议题的研究近些年来开始兴起,而且无论是研究范式还是议题都呈现出丰富多元的景象。首先,在研究范式上,众多的人际传播经典理论被运用到社会治理传播的本土经验中,例如印象形成机制、意义协调管理理论、议程设置、身份认同构建、社会支持理论、社会网络分析法。同时学者们也在致力于人际传播理论的本土化构建,例如围绕“关系”概念来构建理论<sup>[38]</sup>等。其次,所关注的议题也非常多元化,研究比较多的议题依次为城市农民工的人际传播网络结构与身份认同构建<sup>[39-40]</sup>、乡村社会的日常人际传播、医患互动中的人际传播、群体性事件中的人际传播等。最后,这项研究比较容易获得经验资料,所以实证研究方法的运用比较多。

### 2. 组织传播

社会治理强调政府、企业、民间组织和公民在内的各类主体通过积极的合作来有效解决集体问题。新媒体时代这些合作方式已经超越了传统组织的局限,适应网络数字化互动传播模式的一些新的组织

形态正在形成。鉴于此，“经由传播而组织”的动态组织传播观开始成为社会治理中的组织传播研究的新范式。<sup>[41]</sup>在具体的理论运用方面，现有的研究仍然聚焦于一些经典理论，例如组织传播中的权力博弈、组织认同构建、社会资本等。研究议题方面，得到较多关注的有乡村社会治理中的组织传播、自媒体在组织传播中的使用以及动员式治理中的组织传播机制<sup>[42]</sup>等。

### 3. 大众传播

新媒体时代，大众传播作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基本沟通与组织手段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前文讨论的社会治理传播中的沟通、舆论与谣言机制均属于大众传播的范畴。随着自媒体的盛行，公众开始广泛参与“拟态环境”的建构，尤其是“意见领袖”在建构拟态环境中成为关键力量。<sup>[43]</sup>这些新特点影响了社会治理中大众传播的机制与效果。大众传播理论是传播学中比较成熟的理论，很多的理论范式被运用于社会治理传播的研究，而且在知识结构方面主要围绕“媒介、受众、效果”等要素展开。首先，大众传播的媒介被认为具有相对独立的职能权力，<sup>[44]</sup>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其次，在受众方面的研究包括技术层面和结构层面的，例如弹幕视频受众分析<sup>[45]</sup>和如何保障社会弱势群体共享大众传播资源<sup>[46]</sup>等。最后，在效果方面，学者看到了自媒体技术带来的大众传播效果不确定的特点，<sup>[47]</sup>而且一些经典理论如议程设置和涵化等也在案例研究中得到运用。

## （四）社会治理传播的场域

人类进入现代社会后，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展和强度的提高，除人类社会一直面临的自然风险外，各种形式的人为风险如市场风险、技术风险、生态风险和生活风险等也大量涌现。基于这种共识，可以说人类整体上也进入了风险社会。因此，社会治理传播研究高度关注对风险社会场域中的传播与治理机制。风险社会场域是根据人类社会普遍具有的属性来界定的。另一个方面，结合中国的国情，以实际居住区域来划分，乡村和城市社区则构成了社会治理传播研究的另外两大场域。

### 1. 风险社会

新媒介的广泛使用给风险治理带来的影响是一柄双刃剑，即“在引导风险认知、决策的同时，也可能成为扩大和再生产风险的因素”，<sup>[48]</sup>可以说深刻形塑了风险传播的机制和过程，也给风险治理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在风险传播机制的研究中，普遍认为新媒介起到了社会放大风险<sup>[49]</sup>的作用。因此“风险的社会放大分析框架”理论在案例研究中得到广泛使用，而且这种框架不仅塑造民众的风险认知，也激发了社会的恐惧情绪。其中，风险传播中底层民众滋生的“信息剥夺心理”<sup>[50]</sup>也会起到这种放大的作用。在风险传播的研究对象方面，关注比较多的有突发事件危机传播、社会冲突、舆论安全和谣言风险等。在风险治理的对策方面，从宏观角度看，涉及到风险社会下传播秩序的重构，<sup>[51]</sup>具体的做法是提高全社会使用新媒体的能力，如塑造政府形象、提高媒体素养、发挥好专家体制、通过风险沟通及共识会议提高参与程度等。

### 2. 乡村社会

乡村社会治理传播研究也同样置身于“媒介化社会”<sup>[52]</sup>的背景中，而且在乡村社会治理媒介化转向的过程中，研究范式和方法也在发生变化。其中，在研究范式上主要有发展主义和传播政治经济学两种类型。发展主义范式也是一种功能主义视角，例如认为乡村传播具有政治认同、社区整合和发展等功能，这也被视作一种旨在实现乡村善治的“软性”治理策略。<sup>[53]</sup>与此同时，有些学者呼吁要通过社会治理传播改善乡村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甚至提出应该实现用传播政治经济学取代发展主义传播学<sup>[54]</sup>的范式转型，当前这类研究也越来越多。在传播层面上，社会治理的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都分别得到足够的关注，当然经验中也发现很多时候这三个层面的传播是融合在一起的。鉴于乡村生活具有很强的地方特点，有学者提出要构建中国乡村传播学，<sup>[55]</sup>致力于本土化理论建设。这种努力不仅体现在一些本土的经验观察上，例如对乡村人际传播中“招呼”“聊天”“闲话”和“骂街”等类

型的研究,<sup>[56]</sup>也体现在对传播模式本土概念的提炼上,例如“协同型传播”<sup>[57]</sup>概念等。

### 3. 城市社区

城市社区治理传播研究主要讨论城市化和媒介化双重背景下社区传播与治理的机制和过程。不同于传统的社区传播,新媒体时代“社会传播生态已被互联网传播逻辑重构”,<sup>[58]</sup>其特点可以概括为“网络社会的缺场交往与在场治理。”<sup>[59]</sup>这使得社区传播成为现代社区治理重要的具有多重意义的要素。鉴于这种特征,有学者提出“构成性社区传播理论”,干脆将社区看作是由传播所构成的网络。<sup>[60]</sup>社区传播的治理功能主要体现在通过充分运用新媒体技术实现更加有效的沟通、协商和合作,从而实现善治目标。关于实现这些功能的具体机制的讨论有维系社区共识、培养居民的社区归属感、“地点制造”、社区传播参与机制和培育媒介素养等。由于社区传播具有上述这些新特征、新功能、新机制,一定要充分发挥新媒体在社区传播中的作用。

## 三、社会治理传播研究的展望

前面根据本文尝试搭建的一个涵盖社会治理传播基本要素、沟通机制、层次与场域等方面的知识结构,对现有的相关研究文献进行了大致的梳理。虽然限于篇幅,很多有价值文献不能一一列出,同时学者对这些类别的关注与用力并不均衡,但是总体上所使用的范式、理论、方法、类型等方面也算比较丰富了。和很多新鲜事物一样,社会治理传播研究存在诸多不足,但是依然可以对它进行一些积极乐观的展望。

### (一)“社会治理传播学”何以可能

大量文献致力于新媒体时代社会治理与传播学交叉问题域的研究,学术积累已经比较丰富。从逻辑的自治度到理论与实践的关联度,从议题的广泛性到范式、方法的丰富性等方面看,虽然还有很多不足或者说还有些粗糙,总体上也相对成熟了。因此,这些聚焦于共同问题域的研究成果,应该可以支撑起一个属于自己内涵与外延的学科范畴。与这种状况脱节的是,虽然这些文献聚焦于共同的问题域,但是仍然停留在碎片化的研究状态。一个新的社会现象产生,伴随着新的研究领域出现,自然而然地亟需一个新的学科范式来统摄这些新的现象与研究领域。

另一个特点是,当前从事社会治理研究的学者大多拥有政治学、社会学和公共管理学的学科背景,普遍对新媒体技术形塑的社会治理传播现象关注不够。与之相反,从事研究社会治理传播现象的大多数来自传播学者,这项研究至少当前是他们在挑大梁。但是问题在于,很多传播学者对政治学、社会学、公共管理学等诸多相关学科的知识储备或训练不足,因而影响了研究水准。在新媒体技术广泛应用于社会治理传播的背景下,社会治理研究亟需更多关注传播现象,传播学研究也亟需广泛涉猎社会科学的各类知识和理论范式。2014年首届中国新媒体研究高端论坛上,学者们就纷纷呼吁“走出传播学”,例如提出“新媒体研究典型的交叉特征显然不能被原有的学科体系所涵盖,新的学科知识体系架构亟待确立。”<sup>[61]</sup>随后也不断有学者在呼吁这种知识重建。

可见,诸多条件已经具备,此时把社会治理传播研究独立出来,创立一个新的研究学科“社会治理传播学”,是有其必然性和可行性的。社会治理传播学是以社会治理中的传播现象与过程为研究对象,主要采取实证方法进行研究,旨在探讨蕴涵在这些现象与过程中的通则或规律。因此,社会治理传播学大体上属于以现实经验为考察对象的社会科学研究,是新媒体时代跨越社会治理研究与传播学的交叉学科。

### (二)走出“内卷化”的窘境

李金铨指出当前传播研究领域普遍面临着“先天的传统薄弱,理论资源缺乏,视野和范围都嫌狭小,后天又失调,学界不断简单加以再生产”的“内卷化”现象,就连传播学研究重镇美国也存在这



种“精致的平庸”。<sup>[62]</sup>国内的传播学者也为此焦虑，认为媒体研究整体上存在着“内外交困、越走越窄、自说自话”的内卷化状态。<sup>[63]</sup>在检视社会治理传播研究的众多文献中，也发现这种内卷化问题仍然常见。这体现在：西方传播理论或相关理论的引入，确实带来了很多研究的新视角、新维度，但是大多数的研究停留在套用这些理论范式来阐述中国语境下的具体经验，真正有突破性的研究发现还比较少。内卷化的典型特征是有量的增长而无质的增长。要走出内卷化困境，一定要坚持以实现知识增量为目标来开展研究，即把知识增量作为衡量具体研究项目和方法的首要标准。

就社会治理传播研究而言，实现知识增量的研究，除了学术规范做到更加严谨和研究方法更加科学之外，还需要考虑它的跨学科特征和经验研究的基本特征。其跨学科特征要求在研究过程中一切以问题意识为导向，打破学科之间的门户之见，实现多科学之间的对话、交流和融会贯通。社会治理传播学作为经验科学，实现其知识增量的途径大致有三个：一是揭示出并概念化一些新的经验，即新媒体时代在社会治理传播方面出现的前所未有的新现象新经验新机制等；二是提供新的理论解释，这只能是在与一些前沿的竞争性理论展开对话的过程中得以实现。这种对话的结果是评估出理论的优劣，其标准主要看其逻辑自洽程度与反常现象的多寡；<sup>[64]</sup>三是提供新的研究方法。新媒体时代大量新技术的层出不穷，“为新媒体研究创造了无数令人屏息的数据采集和分析手段……从某种程度上说，新媒体对方法的革命要胜于对理论的冲击。”<sup>[65]</sup>这是一个城市化、新型工业化、媒介化等多重转型或变革重叠的时代，对以上三个方面的知识增量来说都是从来未有的好契机。

### （三）面向国际化的“本土化”

近现代以来流行的社会科学理论与范式大多源自西方学术，对此大家一直在追问这个问题，即“我们如何从优吸收西方学术，而不沦为它们的‘翻版’，又如何超越西方文化中心主义？”<sup>[66]</sup>正是怀着这个问题意识，中国学者在进行经验研究时普遍有种“本土化”理论建构的愿望。早在上世纪90年代，传播学界已就本土化的主旨达成一个共识，即“关注自身特殊经验，只有在辨析本已经验的基础上才能建构自己的操作理论及分析框架，其意义在于通过对自身的研究，建立起与世界学术对话的基础。”<sup>[67]</sup>显然大家不满足简单移植西方理论的做法，而力求诉诸理论层面的主体性构建。从这种问题意识来看，本土化研究从产生起就与国际学术之间形成了持续的张力，也可以说二者是以既“对立”又对话的方式存在着。

如何消解这种张力？在学者们的争论中大致可以归纳出三种消解方式：第一种提出在我们还很欠缺学术准备和学术积累的情况下，提“本土化”为时尚早。<sup>[68]</sup>第二种认为本土化是个伪命题，因为一切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都是无一例外地应用于某个具体情景中。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大家都是“本土化”，也就无所谓“本土化”了，因此应该追求的是长远的学术价值。<sup>[69]</sup>第三种认为“本土化”是具有历史使命的真命题，因为无论如何我们都要突显社会科学的主体性特征，而且从方法论角度看，定性研究需要处理的众多资料属于地方性知识，它一定是本土化的。<sup>[70]</sup>本文认为社会治理传播研究应该采取第三种处理方式，但是也应该吸收前两种方式中的合理成分，例如本土化研究首先要有充分的学术准备与积累，其次要追求长远的学术价值等。通过反思本土化的一些误区，会发现本土化不是“要不要”的问题，更不是“自娱自乐”的问题，而是要思考如何处理好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问题。一言以蔽之，就是要做好面向国际化的本土化研究。做到这点，首先要在立足本土经验进行研究的同时，时刻关注与国际主流学术的理论对话。社会科学的主体性不仅体现在如何为本国学术或实践做贡献，也要体现在为国际主流学术做出贡献，并能够得到国际学术界的尊重，这二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其次，这种对话能否有效进行取决于我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从具体的本土经验中提炼或抽象出人类社会的普遍经验。因为本土化的研究成果如果没有办法上升到人类的普遍经验层面，就失去了对话的前提。这点对于新媒体时代社会治理传播研究而言尤为重要，因为它的研究对象是整个人类社会差不多正在



同步经历的一场深刻社会变迁带来的经验与体验。

总之,本文所做的努力集中于试图提出“社会治理传播学”这一新的学科分支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并根据相关的大量文献搭建了它的初步知识框架。当然这个知识框架还比较简易,还有更多的议题和知识需要整合进来。同时,社会治理传播学的学科价值也将在更多的理论与实践上去接受检验。因此,这仅仅是个开始。

## 参考文献:

- [1] 燕继荣. 社会变迁与社会治理——社会治理的理论解释 [J]. 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5).
- [2] 彭兰. “新媒体”概念界定的三条线索 [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6 (3).
- [3] 刘文辉. 传媒权力生成——另一种考察视阈 [J]. 北方论丛, 2009 (4).
- [4] 唐荣堂, 童兵. “传播即权力”: 网络社会语境下的“传播力”理论批判 [J]. 南京社会科学, 2018 (11).
- [5] 郝雨, 路阳. 媒介权力运演及社会权力结构嬗变——新媒体发展对社会权力结构的冲击与重塑 [J]. 新闻大学, 2014 (5).
- [6] 喻国明, 马慧. 互联网时代的新权力范式: “关系赋权”——“连接一切”场景下的社会关系的重组与权力格局的变迁 [J]. 国际新闻界, 2016 (10).
- [7] 杜智涛, 张丹丹. 技术赋能与权力相变: 网络政治生态的演进 [J].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8 (1).
- [8] 朱燕丹, 靖鸣. 传播与权力的博弈: 新媒体视域下社会治理的问题与对策 [J].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4).
- [9] 赵继伦. 论大众媒介权力的滥用及其社会控制 [J]. 东北师大学报, 2003 (4).
- [10] 邵培仁, 范红霞. 传播民主真的能够实现吗?——媒介象征性权力的转移与话语民主的幻象 [J]. 现代传播, 2011 (3).
- [11] 李青. 对传播媒介权力的思考 [J]. 国际新闻界, 1999 (3).
- [12] 隋岩. 群体传播时代: 信息生产方式的变革与影响 [J]. 中国社会科学, 2018 (11).
- [13] 张峰, 孔繁斌. 信息空间视角下的社会治理模式创新 [J]. 学海, 2016 (6).
- [14] 臧雷振. 新媒体信息传播对中国政治参与的影响——政治机会结构的分析视角 [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6 (2).
- [15] 邱新有, 黎莉. 信息传播影响社会秩序的四维分析 [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09 (5).
- [16] 陆阳. 信息社会学的一个新视阈: 公共领域与公共信息空间 [J]. 情报资料工作, 2013 (5).
- [17] 白献阳. 公共信息传播机制的探讨 [J]. 北京档案, 2011 (10).
- [18] 胡春阳. 传播研究的话语分析理论述评 [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 2007 (5).
- [19] 谢立中. 多元话语分析: 社会分析模式的新尝试 [J]. 社会, 2010 (2).
- [20] 张康之. 论社会治理话语重构问题 [J]. 南京社会科学, 2017 (3).
- [21] 刘伟. 电子治理: 协商民主视野下电子政务发展演进的新路向 [J]. 广西社会科学, 2008 (9).
- [22] 谢新水. “伯姆对话”与合作治理沟通机制的建构 [J].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4 (3).
- [23] 袁方成, 张翔. 使协商民主运转起来: 技术如何可能——对“开放空间会议技术”及其实践的理解 [J]. 甘肃行政学院学报, 2015 (4).
- [24] 汪波. 大数据、民意形态变迁与数字协商民主 [J]. 浙江社会科学, 2015 (11).
- [25] 张爱军, 张媛. 网络协商民主的实践优势、困境及其化解 [J]. 江淮论坛, 2019 (4).
- [26] 葛自发, 王保华. 从博弈走向共鸣: 自媒体时代的网络舆论治理 [J]. 现代传播, 2017 (8).
- [27] 张志安, 晏齐宏. 新媒体与舆论研究: 问题意识及提升路径 [J]. 新闻大学, 2017 (5).
- [28] 吴锦鸣, 刘宏. 上访人微博舆论动员的方式及效果研究——以新浪微博“上访人群落”为例 [J]. 现代传播, 2016 (7).
- [29] 姜红, 开薪悦. “可见性”赋权——舆论是如何“可见”的? [J]. 苏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3).
- [30] 曲飞帆, 杜骏飞. 复杂系统论: 中国网络舆论研究的范式转向 [J]. 南京社会科学, 2017 (11).
- [31] 阮璋琼, 尹良润. 微博谣言的类型与话语焦点——基于 307 条微博谣言的内容分析 [J]. 当代传播, 2014 (4).
- [32] 郭小安, 董天策. 谣言、传播媒介与集体行动——对三起恐慌性谣言的案例分析 [J]. 现代传播, 2013 (9).
- [33] 李丹丹, 马静. 复杂社会网络上的谣言传播模型研究综述 [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16 (12).
- [34] 王长春, 陈超. 基于复杂网络的谣言传播模型 [J].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2012 (1).

- [35] 李元来. 多层面相上网络谣言的悖论特性及长效治理 [J]. 中州学刊, 2016 (12).
- [36] 匡文波, 郭育丰. 社会治理视域下网络谣言消解模式探析 [J]. 西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 (3).
- [37] 夏志杰, 吴忠, 王筱莉, 谢妍曦. 社会化媒体谣言自净化机制的定量模拟研究 [J]. 现代情报, 2019 (3).
- [38] 翟学伟. 本土的人际传播研究: “关系”的视角与理论方向 [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08 (3).
- [39] 陶建杰. 农民工人际传播网络结构分析——基于宏观视角的实证研究 [J]. 现代传播, 2016 (10).
- [40] 袁靖华. 关系障碍: 人际传播视角下的边缘身份融入——基于在浙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调查 [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5 (5).
- [41] 谢静. 经由传播而组织——一种动态的组织传播观 [J]. 新闻大学, 2011 (4).
- [42] 陈楚洁. 动员式治理中的政府组织传播: 南京个案 [J]. 重庆社会科学, 2009 (9).
- [43] 靖鸣, 张朋华. 自媒体时代“拟态环境”的重构及其对大众传播理论的影响 [J]. 现代传播, 2019 (8).
- [44] 倪虹. 大众传播媒介的权力 [J]. 新闻与传播研究, 1999 (1).
- [45] 袁京. 试论大众传播视角下的弹幕视频受众分析 [J]. 传播力研究, 2019 (35).
- [46] 宋小卫. 保障社会弱势群体共享大众传播资源——解读社会法的有关规定 [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04 (1).
- [47] 刘春雨, 刘楠. 充满概率的大众传播 [J]. 东南传播, 2019 (7).
- [48] 刘丹凌. 试论传媒在风险社会中的双面性 [J]. 社会科学战线, 2010 (5).
- [49] 曾繁旭, 戴佳, 王宇琦. 技术风险 VS 感知风险: 传播过程与风险社会放大 [J]. 现代传播, 2015 (3).
- [50] 李春雷, 钟珊珊. 风险社会视域下底层群体信息剥夺心理的传媒疏解研究——基于“什邡事件”的实地调研 [J]. 新闻大学, 2014 (1).
- [51] 崔波. 风险社会下传播秩序的重构 [J]. 东南传播, 2009 (11).
- [52] 孙信茹, 杨星星. “媒介化社会”中的传播与乡村社会变迁 [J]. 国际新闻界, 2013 (7).
- [53] 王越, 费爱华. 从组织传播到大众传播: 国家治理乡村社会的策略演进 [J]. 南京社会科学, 2012 (4).
- [54] 沙垚. 乡村传播研究的范式探索 [J]. 新闻春秋, 2015 (4).
- [55] 李红艳, 谢咏才, 谭英. 构建中国乡村传播学的基本思路——传播学本土化的一种探索 [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5 (2).
- [56] 费爱华. 乡村社会日常人际传播及其社会功能 [J].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6 (4).
- [57] 蒋旭峰. 乡村治理中的传播模式演进——从“抗争性政治”到“合作性政治” [J]. 当代传播, 2011 (6).
- [58] 吴麟. 新媒体环境下的社区传播与社区治理 [J]. 社会治理, 2017 (10).
- [59] 刘少杰. 网络社会的缺场交往与在场治理——评《社区传播论》 [J]. 新闻与写作, 2018 (11).
- [60] 谢静. 社区: 传播的构成 [J]. 苏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3).
- [61] 刘方远, 谭天. 对话新媒体研究: 范畴、路径与问题——首届中国新媒体研究高端论坛综述 [J]. 现代传播, 2014 (5).
- [62] 李金铨. 传播纵横: 历史脉络与全球视野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91.
- [63] 曲飞帆, 杜骏飞. 超越功能主义范式的中国新媒体传播研究——以 2015 年以来的研究文献为例 [J]. 当代传播, 2016 (5).
- [64] [美] 拉瑞·劳丹. 进步及其问题 [M]. 刘新民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99: 26-31.
- [65] 刘洋, 李喜根. 新媒体传播研究及知识增量 [J]. 国际新闻界, 2012 (8).
- [66] 李金铨. 传播研究的时空脉络 [J]. 开放时代, 2017 (3).
- [67] 潇湘. 传播学本土化的选择、现状及未来发展 [J]. 新闻与传播研究, 1995 (4).
- [68] 王怡红. 对话: 走出传播研究本土化的空谷 [J]. 现代传播, 1995 (6).
- [69] 谢宇. 走出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讨论的误区 [J]. 社会学研究, 2018 (2).
- [70] 周晓虹. 社会学本土化: 狭义或广义, 伪问题或真现实——兼与谢宇和翟学伟两位教授商榷 [J]. 社会学研究, 2020 (1).

[责任编辑: 华晓红]